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马可·波罗在中国

杨志玖 著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马可·波罗在中国

杨志玖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在中国 / 杨志玖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4

(津沽名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774-0

I. ①马… II. ①杨… III. ①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生平事迹 IV. ①K835.46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960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隆晖伟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6 插页 188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杨志玖先生(1915—2002)

浩”，令他⁶⁰与安童治省事”，二十三年三月，令其
“仍中书右丞，与郭佑并领钱谷”，说明他手脚
干净，不贪污，而且有理财之能。至元二十四
年桑哥当政时，他建议恢复尚书省，但并不附
合桑哥。桑哥检核中书省财务，查出有亏欠钱
钞事，考尤丁即自伏（《元史·卢世荣传》），承认
过失，但非贪污。桑哥败后，他与汉官崔或上
书弹劾桑哥“当国四年，诸臣多以贿进，亲旧皆
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建议
“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并除名为民”（至元二十
八年五月）。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他以“久居其
任，乞令免署，惟食其禄，与议中书省事”，得
到批准。是年十月，仍令其与何荣祖等“汰内外
官府之冗滥者”。⁶¹到成宗元贞元年五月，还命他
同何荣祖等“厘正选⁶²法”（清理制定选官法令）。考
尤丁是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间始终任职的臣僚。

别都鲁丁的履历不详。他在至元二年二月
任工部尚书（称别鲁丁），十四年十一月以吏部尚
书升中书参知政事，二十~~九~~^八年十二月，以其在
桑哥执政时“以桑哥专恣不肯仕”，⁶³命仍为中书左

出版说明

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称盛。

津沽有独特之历史，优良之学风。自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古今融合，天津开风气之先，学术亦渐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学科重组，南北学人汇聚天津，成一时之盛。诸多学人以学术为生命，孜孜矻矻，埋首著述，成果丰硕，蔚为大观。

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学术发展的面貌及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津沽名家文库”。文库的作者均为某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所收录的著作或集大成，或开先河，或启新篇，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著的价值已经从单纯的学术层面生发出新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创新思想、治学精神，比学术本身意义更为丰富，也更具普遍性，因而更值得研究与纪念。就学术本身而论，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常研常新的题目，这些可以回答当今社会大众所关注话题的观点，又何尝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这些著作首版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多未曾再版，既为学林憾事，亦有薪火难传之虞。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倡导学术创新、建设学习强国的背景下，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回顾

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次出版的“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包含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五个学科的名家著作，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体现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通，同时具有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可读性。具体书目包括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马汉麟《古代汉语读本》、刘叔新《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顾随《顾随文集》、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雷石榆《日本文学简史》、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王达津《唐诗丛考》、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漆侠《宋代经济史》、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季陶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王亘坚《经济杠杆论》等共二十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和学科的进步，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还需在阅读中辩证看待。同时，由于出版年代的局限，原书在用词用语、标点使用、行文体例等方面有不符合当前规范要求的地方。本次影印出版本着尊重原著原貌、保存原版本完整性的原则，除对个别问题做了技术性处理外，一律遵从原文，未予更动；为优化版本价值，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因排版印刷问题造成的错漏。

本次出版，我们特别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每部著作撰写导读文章，介绍作者的生平、学术建树及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价值，以使读者了解背景、源流、思路、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启发。在此，我们对拨冗惠赐导读文章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铭感于作者家属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

创造条件，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推荐导读作者，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感谢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领导小组的关心支持。希望本丛书能不负所望，为彰显天津的学术文化地位、推动天津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马可·波罗在中国》^①导读

李治安

业师杨志玖先生（1915—2002），字佩之，山东淄博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9月，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39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二位教授，专攻蒙元史。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1949年前）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职。

纵观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其研究广泛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且以精于考证和富有创见著称。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元代回族史稿》。诚然，先生倾注心血最多和成就最卓越的，无疑是马可·波罗来华研究。

马可·波罗是中古伟大旅行家和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他口

^① 编者注：杨志玖先生习惯将“马可·波罗”写作“马可波罗”，原书出版时书名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本次再版为符合现行规范，将书名改为《马可·波罗在中国》，但在导读中提到该书时，为尊重原著原貌，均以《马可波罗在中国》称之。

述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问世以来，流传甚广，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游记》架起了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和东方的桥梁。西方人知中国必先知马可·波罗，据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始终是受其诱导、驱动。马可·波罗来华，是七百多年前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的历史见证，它既是中西交通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又被称为世界十大疑问之一。围绕着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著《游记》的真实性，中外学者曾经进行长达七八十年的“世纪论战”。

先生对马可·波罗的研究，是从这场“世纪论战”的初期，即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现过“马可”即枢密副使孛罗等说法，旋遭学界否定。^①上述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误判，明显属漏洞较多的粗疏比附，但背后也隐含着学者们的某种困惑。素来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没有找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这不能不令中外学人焦急疑惑，同时也容易成为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来华说的重要口实或“把柄”。

1941年夏，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搜集元代穆斯林官员沙不丁等人的相关史料之际，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的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与《游记》相关联的一段记载。受导师向达教授鼓励，先生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②，比勘考订《经世大典·站赤》中“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位使

① 张星娘：《中国史书之上马哥孛罗》，《地学杂志》，1922年，第1—4期。束世澂：《中国史书之上马哥孛罗考》，《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7期。岑仲勉：《枢密副使孛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5本。

②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12期。

者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与《游记》中的 Olatai、Apousca、Coja 完全相同^①，进而考证出《游记》中所述的马可·波罗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等事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文中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 1291 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 1292 年初。这一揭示是迄今汉文记载中唯一可见的马可·波罗在华行踪的考证与研究，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的很高评价。^②该文还被译为英文，刊载于 1944 年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945 年 9 月九卷一期发表了英文摘要。^③

1956 年，向达教授撰文评述说：“（杨志玖）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去波斯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九二〇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④。”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先生的这篇论文。令人欣喜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虽然晚年疾病缠身，没能参阅先生的考证发现，但他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阔阔真”条目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儿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对合赞

① 此三人名称，冯承钧译作“兀刺台”“阿卜思哈”“火者”，张星烺译作“乌拉太”“阿勃施加”“科耶”。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及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

② 杨志玖：《我怎样学元史》，《文史哲》，1983 年，第 5 期。

③ A New Discovery referring to Marco Polo's Departure from the Chinese Sour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Letters. Vol.4, 1944.

Marco Polo quits C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9, 1945(1).

④ 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旅行家》，1956 年，第 4 期。

汗的记事等西方资料，同样考订出马可·波罗离华年代为1291年。^①此与先生的年代考订不谋而合。1970年，英国学者鲍埃勒（John Andrew Boyle）在其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中，又揭示波斯文《史集》有关合赞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见阿鲁浑汗所遣自中国迎娶卜鲁罕元妃同族女阔阔真的火者等使团且与阔阔真成婚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先生的考证结论。^②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教授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首先详细介绍并肯定了先生论文的考证发现。^③这就意味着法、英、美的著名学者相继认证和肯定了先生的研究。由此，先生最先考证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杰出贡献，逐渐被国内外学界所承认。经先生和伯希和、鲍埃勒等“携手”努力，某种意义上竖起了马可·波罗来华肯定说的“大旗”。正如一位世界史专业的教授所云，先生1941年的论证具有某种奠基和决定性意义，倘若没有先生这篇考证文章，讨论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诸多文章的价值就几乎等于零。

然而，时至1966年，德国蒙古史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发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交往》一文，列举出《游记》存在的若干疑点，如扬州做官、献抛石机攻陷襄阳、未提茶叶和汉字书法等，认为马可·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能解决的问

①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9: 392-394.

② John Andrew Boyle. *Rashi al-Din and the Frank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70(14).

③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A Chinese Source Bearing on Marco Polo's Departure from China and a Persian on His Arrival in Persi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76(36): 181-203.

题。^①事实上，类似质疑早已出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ry Yule)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该《导言》曾敏锐指出《游记》记载有多处遗漏，如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鸬鹚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文字，还有《游记》中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成吉思汗死亡及其子孙世系讹误，等等^②。但它并未影响亨利·玉尔对《游记》的整体信任与翻译工作的开展。

针对这些问题与怀疑，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先生有关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而与怀疑说、否定说论战的第一回合也随之拉开序幕。

1982 年可谓先生在 1976 年恢复研究马可·波罗后的“丰收年”。如先生所云：“柯立夫教授的论文和十年‘文革’的结束，激发了我对马可·波罗研究的兴趣。客观条件的改善使我在学术海洋上得以破浪扬帆。”^③这一年，先生连续撰写和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三篇论文。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围绕“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中堂事记》的发郎国人是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三个议题展开，就过去引起质疑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

^① Herbert Franke, 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1966(6): 49-72.

^② Henry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ravels of Marco Polo)*, 本文参阅经法国学者亨利·考狄埃(Henri Cordier)修订的 1929 年重印的第三版上册 Introduction 部分，第 110—112 页。

^③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42 页。

等热点，做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①

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 Haeger）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发现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处，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他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道听途说。^②先生撰《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与海格尔商榷。他考订《游记》所述马可·波罗到波斯、印度以及中国镇江、福州、苏州等城的描述，找出了一些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南方的佐证，雄辩证明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南方。^③

如果说海格尔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仍有可取之处的话，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探险家的足迹》一文，走得更远、更极端。该文全面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还指责《马可·波罗游记》是主要采自波斯旅游手册的“克里空”虚假报道。^④同年10月，先生又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反驳克鲁纳斯的说法。先生指出，《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和汉字，用波斯语称呼中国地名等缺憾，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后仍然保持着本国的习俗文化，对汉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及《游记》记述中的缺点、错误而否定其来华之无可置疑的事实。^⑤

1988年上海师范大学王育民教授撰写《关于〈马可·波罗游

①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② John W. Haeger. 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 *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 1979(14): 22-30.

③ 杨志玖：《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④ 参阅《编译参考》（1982年7月号）中杨德的译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

⑤ 杨志玖：《马可波罗与中国》，《环球》，1982年，第10期。

记)的真伪问题》^①一文,为克鲁纳斯鸣不平,对马可·波罗来华及《游记》提出质疑。为此,先生发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予以回应。尽管王文所列证据与克鲁纳斯大致相同,杨先生依然认真逐一答复,并对怀疑论者的论点予以综合性辩驳。^②

20世纪90年代末,先生与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二回合论战,更为激烈和精彩,先生的马可·波罗研究随之达到高峰。

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博士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研究中国式建筑的“中国通”。1995年她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该书很有特点。此前,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学者只是写些短文或在文章中附带提及。伍德的书却是以一百八十二页的专著来论证此事,所引参考书九十七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竟有十五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和否定说之大成。^③其观点基本是承袭怀疑说的,即集中于“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更为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观点的论证更为充分、更趋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尤其

① 王育民:《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史林》,1988年,第2期。

② 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③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1995.

是1997年初洪允息翻译的中译本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后^①，国内许多非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被伍德书中生动的语言、巧妙的结构所吸引，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华一事产生好奇和兴趣，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马可·波罗研究热潮。

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先生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正在从事的《元代回族史稿》写作，积极着手于对伍德论著的反驳。他先是发表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的论文^②，1999年又撰写《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正文也是十五个专题^③，与伍德博士等持怀疑和否定论者展开新一轮的辩论。

《马可波罗在中国》驳论分为五部分：

1. “旧话重提”，回顾怀疑论者的论题及其失误与缺陷。

2. 以“否认确据”为题，指出伍德一书对《站赤》所载马可·波罗离华史料不能全面认识；兼述“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游记》《史集》《元史》中记载的异同及价值，并指出伍德对此问题的理解偏差。

3. 重点谈《游记》的“版本问题”，认为用版本不同来否定《游记》的真实性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4. “漏载释疑”，对伍德指摘《游记》漏载的瓷器、印刷、汉字、茶叶、缠足、长城等物，逐条予以阐明论证，并指出“因一部书没有记载它可以记载而因某种原因失记的东西，便怀疑、否定其真实性，这不合情理，也很难服人”。

① 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恩）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新华出版社，1997年。

②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结语评析”，澄清伍德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资料来源等误解，并重申两条《游记》所独有而未见于西方同期作品的关键史料：元朝法律笞刑数目和马薛里吉思在镇江的活动。“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用反证法进一步证实伍德观点的不可靠性，明确回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最后，针对争论双方所聚焦的汉籍未发现马可·波罗踪影、《永乐大典·站赤》未提及马可·波罗之名和他的真实面目的问题，进一步予以解答申辩：元代来华并留有纪行的外国人不少，但中国史籍中却不见其名；《永乐大典·站赤》中的重要公文是请示随员口粮问题，无须提及随行成员；马可·波罗书中虽有夸大事实或自我吹嘘等缺点，但全书所记史实基本正确并可与中国史籍印证，有些还能补汉籍记载之不足。伍德博士把他作为一个抄袭者、作伪者，并未能还原马可·波罗的真实面目。

与前几次论辩有所不同，先生撰《马可波罗在中国》不仅旁征博引，驳论结合，有理有节，而且更注重从逻辑上找出对方论证的漏洞，从而使立论反驳在资料与思辨上都显示出其治学严谨、科学客观的素养。该书算得上肯定论的集大成之作。先生还特意邀请南开大学外文系苗菊教授，协助其将十五个专题内容摘要翻译为英文，列于该书目录之后，以便在域外传播。为体现学术研究的各抒己见和百家争鸣，该书又将反驳对象之一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探险家的足迹》汉译文附录在第七专题末。可以说，先生以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与精湛考证能力，又一次击退了伍德等怀疑论、否定论者的新质疑，在国际范围内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

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蔡美彪教授曾撰写《试